

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

邹东涛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日本

市场经济体制

主 编 左中海

副主编 田秋生 谢剑琳 刘 力

SCIENCE & SOCIETY



日本市场经济体制

248/1

主 编 左中海
副主编 田秋生
谢剑琳
刘 力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8号

丛书策划: 邹东涛 杨效杰

丛书组稿: 车满宝 魏鸿彪

丛书设计: 饶 慧

日本市场经济体制

主编 左中海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 武威市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8.5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插页: 12 字数: 221千字 印数: 1—6000册

ISBN7-311-00691-0/F·62 定价: 6.40元

博采众长 加快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
李铁映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



李铁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借光

乌杰

乌 杰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了解和研究外国
市场经济的经验，
作为建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体制的借鉴和借鉴

刘国光题
一九九二年七月

刘国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借鉴外国经验，加速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建立。

孙尚清
一九九三年
八月

孙尚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

总 序

邹东涛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以肯定开始的事物往往以否定告终，而以否定开始的事物，又往往以肯定告终。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在经济体制方面的选择、实践和演进，正好验证了这句哲人睿语。

200多年前，当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之初，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歌颂了它的无限美妙和永恒性。但早期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却为自己的灭亡培育了掘墓人。

70多年前，当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时候，曾向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放射出了普照之光。但几十年后，这种以千百万人的英勇奋斗换来的理想化体制，最终未能把劳动者送上理想化的天国；而原有的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调整，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邹东涛，现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已出版著作有《经济竞争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十字路口上的中国：问题·探索·艰难的选择》等多种，发表论文130余篇。其传记已收入《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当代中国中青年学者辞典》、《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100所高等学校中青年教授概览》等。

人们在历史的沉思之后加深了理性认识，
人们在实践的探索之中走出了思想樊笼。

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的比较

最深刻的哲理，寓于最简单的事实当中。

作为宇宙万物之灵的人类，是以生存斗争为起点的：人类首先必须吃、穿、住、用，然后才能进行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因此，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要进行生产，必须使用资源，而资源又是稀缺的，要使稀缺的资源生产出丰富、优美、廉价的产品和劳务，就必须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这样就引出了四大经济问题或四大经济任务：（1）生产什么？（2）生产多少？（3）怎样生产？（4）为谁生产？这四大经济问题和任务的解决，总是以一定的经济体制为载体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各国各地区已经存在着具体的、千差万别的经济体制，而

表 1

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的问题和任务	资源配置目标	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
（1）生产什么？ （What）	（1）产出最适最优； （2）成本最低。 或“帕累托最优”； 即指该社会达到了如此满意的程度，以致在不减少任何成员福利的情况下，无法再增加任何一个成员的福利。	通过市场竞争，供求变化，价格波动和资源自由流动，来组织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通过国家掌握资源，并通过国家计划，来组织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
（2）生产多少？ （How much）			
（3）怎样生产？ （How）		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契约自由；自我负责。	计划机制：看得见的手；国家负责。
（4）为谁生产？ （Whom）			

从总体上来看，无非是两大类：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即在整体上通过市场竞争、供求变化和价格波动，来实现资源配置；另一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即在整体上通过国家计划来实现资源配置。这可用表 1 加以简明表述。

表 1 只是表明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外在运行机制。形成这种外在运行机制差异的内在结构根据是什么呢？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结构可以通过表 2 加以说明：

表 2

经济体制 的内在结构	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
(1) 产权结构	独立。 由各个独立的企业分别掌握资源和财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产权边界和利益边界都是十分清楚的。	统一。 由国家集中统一掌握资源和财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产权边界和利益边界都是模糊的。
(2) 动力结构	经济利益和物质刺激。 经济行为主体的收入与生产结果密切相联。	行政权力和精神鼓励。 经济行为主体的收入分配与生产结果脱离，或只是一种联系不紧密的外在形式。
(3) 决策结构	分散。 一切生产经营决策由企业自主决定，并完全由自己负责。	集中。 一切生产经营决策由国家集中作出，向企业发布指令，然后由企业去贯彻落实，结果由国家负责。
(4) 信息结构	横向。 信息主要由市场横向传播和接收，企业自由筛选和采纳。	纵向。 主要由政府从下而上收集信息，从上而下发布指令性信息。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计划失灵

在本世纪 20 年代之前的 200 年左右时间里，世界上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是远离市场的。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对于调动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和效率，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它创造的生产力水平比过去历史上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但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实现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残酷剥削、经济垄断、外在性、失业、严重两极分化、劳动群众没有社会保障、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的历史是以血与火的内容载入编年史的。尽管它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人们对它的鞭挞总是大于赞颂。这些社会问题到本世纪 20 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出现了从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于是，在 30 年代之后，出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双重否定。凯恩斯主义从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方面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作了否定，而发轫于苏联、二战之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政府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对市场经济作了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体现在建立之初的一段时间，曾对推动经济发展和铲除社会的弊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 60 年代以后，普遍出现了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的严重问题。差不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干预又普遍出现停滞膨胀。于是，人们又惊呼“政府失灵”和“计划失灵”！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效率和活力，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又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称此为“市场之谜”。没有政府和国家计划，就没有经济秩序和社会公正，而政府过多的

干预和过于集中的计划管理，又出现低效、滞胀和官僚主义。人们称此为“政府之谜”和“计划之谜”。

那么，促进社会经济有效、有序、公正、高速发展的主导力量是什么？曾一度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一种是市场经济派，一种是政府干预派。两派观点曾长期论争。但这种论争不是两军对奕，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终结，而是互相吸收和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共识：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早已被历史所淘汰，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和过多的政府干预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既具有完备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又具有适度政府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现代市场经济，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

经济学家从理性的角度对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有效结合作了充分的分析。人类社会首先不能没有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和集中计划相比，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 (1) 能够使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 (2) 能够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
- (3) 能够更好地提供对经济增长的刺激和贯彻经济增长的目标；
- (4) 可以提供广泛的信息，并且信息的成本不高；
- (5) 可以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

而对“政府失灵”和“计划失灵”，经济学家们也作了深刻分析：

(1) 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是政府官员对权力的运用，但政府官员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其行为并非都是崇高的，其动机并不必然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因而政府决策并不必然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2) 制订正确的计划和进行正确的干预需要有充分可靠的信息，而政府掌握的信息往往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失真的。

(3) 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客观上要求大量举办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缺乏内在动力。

(4) 实行经济计划化和政府干预客观上要求决策权力集中，而权力的集中则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滋生腐败，引起群众不满而积极性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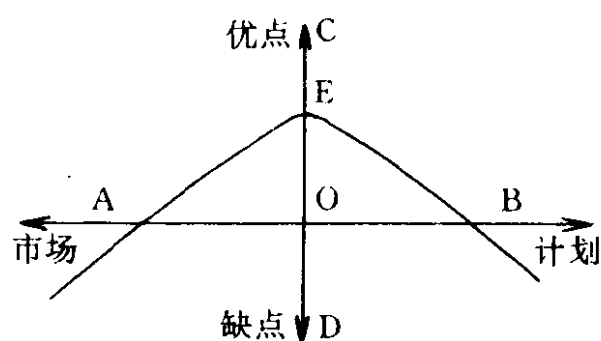
(5) 经济计划化与“思想国家化”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思想国家化”则会导致蒙昧主义，从而使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

二元机制的“凸性组合”和“非凸组合”

由于“政府失灵”和“计划失灵”，6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形成了经济改革的浪潮，改革的基本点和大趋势虽然是扩大市场机制，建立、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缩小政府干预和计划调控。但是，却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放弃政府干预和计划调控，彻底回到20年代之前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完全的市场经济一直持审慎态度，而是强调二元机制——计划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直把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加以坚持，改革中实行二元机制相结合，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而改革的原则是：引进市场调节，但不放弃计划经济。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把计划经济当作敌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它们对原有市场经济体制的调整也是实行二元机制相结合。人类社会在二元机制相结合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然而，不同的国家实行二元机制相结合的实践结果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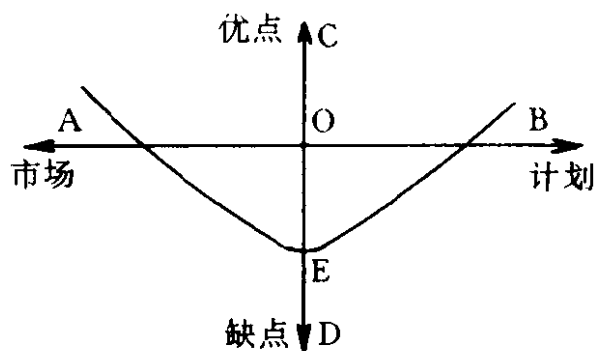
运用二元机制调节经济的有效性证明是非常合理的：市场机制有优点也有缺点，计划机制同样有优点也有缺点。完全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点大于优点，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完全的

计划调节会使计划的缺点大于优点，从而导致“计划失灵”。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则万万不能；计划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计划也万万不能。当二元机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计划的优点会克服市场的缺点，市场的优点会克服计划的缺点，从而实现计划和市场二元机制最优组合，即“凸性组合”。这可以通过下图得到说明：



在上图中，OA 方向代表市场机制的强化，OB 方向代表计划机制的强化，OC 方向代表优点的增加，OD 方向代表缺点的增加。随着市场机制单向加强，其优点会减少，缺点会增加；随着计划机制的单向加强，同样其优点也会减少，缺点也会增加。当二元机制结合在一起时，其缺点都被克服，功能达到最优点（即凸点）。

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二元机制结合的结果并不象理论分析的那样理想化。当二元机制结合时，出现的并非上述结果，而是相反的结果；市场的缺点抵销了计划的优点，计划的缺点抵销了市场的优点，从而出现了二元机制的缺点最大化，即“非凸组合”。这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正好概括了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出现的共同现象：在引进市场机制之后，效率并未得到应有的提高，反而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普遍混乱。用中国的话说，就叫做“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几乎困扰着所有发展中国家，也困扰着中国，使这些国家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并非所有国家都出现了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耐人寻味的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在引入计划机制后，却并未出现“非凸组合”，如法国、北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它们都制订政府经济计划，这些计划都对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要从体制本位论的角度分析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关系。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二元机制本身，而在于二元机制相结合的体制基础：是以市场经济为“皮”，计划调节为“毛”，还是以计划经济为“皮”，市场调节为“毛”呢？二元机制相结合的体制基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市场经济为本位基础引进计划调节和政府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计划调节和政府干预都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基础

上的；另一种是以计划经济为本位基础引进市场调节。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不存在或很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也是不健全的。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凡是以市场经济为本位引进计划调节和政府干预的，一般都能较好的实现二元机制的“凸性组合”；而以计划经济为本位引进市场调节的，出现的则是二元机制的“非凸组合”。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为这种“非凸组合”所困扰，以致经济学家们把此称为“斯芬克斯之谜”和“哥德巴赫猜想”，甚至有的人提出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得三个“诺贝尔奖”也不为过。

实际上，二元机制“非凸组合”的根源，就存在于“姓社姓资”的思想理论之中，就在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打上了“主义”的“钢印”。在实践上，则表现为实行二元机制的结合究竟是以谁为“皮”，以谁为“毛”，以谁为“干”，以谁为“枝”。世界范围的实践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如果在计划经济之“树”上嫁接市场调节之“枝”，结出的会是苦果；只有在市场经济之“树”上嫁接计划调节之“枝”，才会结出香甜可口的丰硕果实来。这正是解开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谜”的根本点。

市场恐惧—市场辅助—市场本位： 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艰难道路

中国解放40多年来，在经济体制上走了一条“市场恐惧论——市场辅助论——市场本位论”的艰难道路。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当时的历史条件使我们必然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和十恶不赦的人类炼狱，从而坚决地排斥之，集中计划的程度越来越高。

在过去许多年中，我们曾经在许多问题的认识上头与脚都是倒立着的。我们曾经花了很多的精力，并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去对计划经济证实和对市场经济证伪。然而，被理论证实的却被实践证伪，被理论证伪的则被实践证实。理论上的优越性常常被实践蒙上阴影，而理论上的非优越性又往往被实践罩上光环。其结果，经济效率越来越低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为了解决长期令人焦虑的经济问题，加之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浪潮的推动和示范，于70年代末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此时，计划经济“坚冰”的表层开始融化，市场调节引入了社会经济生活，改革或明或暗、或快或慢总是在不断地扩大市场的力量。但在前13年的改革过程中，浮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姓社姓资”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歇，它不断地冲击和钳制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趋向。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承认有限度的市场调节，不承认整体上的市场经济。对于镶嵌在计划经济之“笼”中的市场调节，时不时地受到简单粗暴的批判和否定。然而，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却是远离当代实践的、十九世纪之前的古典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则成了替罪羊。就象一个错误的方程永远找不到正确的求解一样，一个对象不准的批判和否定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由于浮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脱离实践的理论教条，因而，我国市场化趋势的改革，就必然存在着可逆性和摇摆性，即便是党的十三大规定了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一层窗户纸之隔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体制框架，也未能避免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体制复归及其经济全面滑坡。

好在人民群众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关注是“碗里的肉，身上的衣，家里的房子，钱包里的货币”。改革前30多年计划经济的实践，人们已经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它的弊端和不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切身